

第8辑

都市文化研究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城市史与城市社会学

Urban Cultural Studies

URBAN HISTORY AND URBAN
SOCIOLOGY



上海三联书店

第 8 辑
都市文化研究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城市史与城市社会学

Urban Cultural Studies

URBAN HISTORY AND URBAN
/ SOCIOLOGY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史与城市社会学 / 孙逊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7

(都市文化研究.第8辑)

ISBN 978-7-5426-4285-1

I. ①城… II. ①孙… III. ①城市史—上海市—文集②城市
社会学—上海市—文集 IV. ①K295.1-53②C91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7529 号

城市史与城市社会学(都市文化研究第8辑)

主 编 / 孙 逊

执行主编 / 陈 恒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450 千字

印 张 / 25.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285-1/C·486

定 价 / 50.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56475597

目 录

城市史与城市社会学

- 1 对话查尔斯·蒂利——城市史与城市社会学
/布鲁斯·斯特夫 文,奚昊杰 译 2
- 2 关于城市问题的探索性论纲
/曼纽文·卡斯特尔 文,牛俊伟 译 41
- 3 城市研究的新工具
/曼纽文·卡斯特尔 文,牛俊伟 译 47
- 4 城市理论
/唐·马丁代尔 文,王鸣彦 译 51
- 5 美国现代新城的理论与实践
/王 洋 95
- 6 笑看浮华——公寓生活的魅力
/王 旭 107
- 7 现代派文学与大都会——从波德莱尔的“游荡”到卡夫卡的“睡眠”
/陈晓兰 121

- 8 现代人的“都市病”：对城市化的怀疑与反思
/赵静蓉 136
- 9 作为审美对象的城市
/刘旭光 144
- 城市与社会**
- 10 众生喧哗：网络流行语的生成机制与内涵阐释
/张 蕾 156
- 11 城市的“面子”与“里子”——以广州“水浸街”与“穿衣戴帽”工程为例
/夏 泉 170
- 12 从“帝都”到“天下”——“主体空间”视域下的秦汉都城研究
/张腾辉 177
- 13 本土视角与边缘维度——近代城市商业小说
/施 晔 194
- 14 徽州汪氏在都市的迁徙及其商业活动——以苏州吴趋汪氏为例
/陈加林 218
- 15 都市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与抵抗实践——对《上海屋檐下》的日常生活
内涵再解读
/张 进 张慧敏 239
- 16 地方资源与边疆城市的文化建构——以滇中城市群重要城市曲靖为例
/张永刚 张 婷 249
- 17 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都市中高型家具的发展
/梁 旻 257

上海文化

- 18 晚清上海的外语培训班——以英华书馆和上海同文馆为个案的研究
/李亦婷 268
- 19 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外商电台及其影响
/张姚俊 281
- 20 怀旧、记忆、历史们——以彭小莲的“上海三部曲”为中心
/林春城 296
- 21 令人质疑的“个人选择”——女性杂志阅读经验与青年女性主体性
/冯芃芃 Sue Thornham 309

艺术中的都市文化

- 22 由单干到集体：上海评弹艺人国营化的心态研究（1949—1951）
/王亮 320
- 23 旗袍与人民装：社会转型下上海评弹艺人的身体阈限（1949—1951）
/张盛满 335
- 24 从乡村到都市——近代上海女子越剧的流行与社会文化变迁
/张雯 347
- 25 都市男女时尚杂志中的女性广告形象对比研究——两性视角下女性
广告形象的表现形态分析
/聂艳梅 严维 361
- 26 都市“公共艺术”与“公众趣味”之辨——从“生活美学”的视角观之
/刘悦笛 377

圆桌会议

27 彭本乐先生访谈摘录

/解军整理

390

城市史与城市社会学

对话查尔斯·蒂利

——城市史与城市社会学

布鲁斯·斯特夫文 奚昊杰 译

作者按语：米歇尔·帕尔默(Michele Palmer)为此次访谈承担了全程录制工作。玛莎·麦考密克(Martha McCormick)将之整理成文字。史蒂文·帕克(Steven Park)负责了编辑事务。我要先向他们表示感谢。对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作的修改、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的一贯支持,也一并致谢。访谈过后,蒂利教授离开了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转而担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社会科学约瑟夫·伯滕威泽(Joseph L. Bottenwiesser)讲座教授,从事社会研究。此事在文中会有谈及。

斯特夫(Stave):我们不妨先来谈谈你的早年生活吧,如生日、出生地、早年教育、家庭状况以及离开老家的情况。如何?

蒂利(Tilly):好的。1929年,我生于伊利诺斯州(Illinois)芝加哥西郊的朗伯德(Lombard)。我早年生活大都是在芝加哥北向朗伯德的芝加哥奥罗拉(Aurora)、埃尔金(Elgin)铁路沿线地区度过的。高中是在伊利诺斯埃尔姆赫斯特(Elmhurst)的约克高中(York High School)念的,后来进了哈佛大学读书。家里有5个小孩,我是老大。他们4个后来有的当了教授,有的从事与学术有关的事业。我们几个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

斯特夫: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蒂利:父亲干过的行当很多,如文书、助理会计、图书推销员等。晚年大部分时间做的是商业报表推销员。

斯特夫:朗伯德风土人情如何?

蒂利:我小的时候朗伯德还只是半乡村半郊区,与芝加哥城区稍稍搭界。不过是个小镇,你可以搭乘固定班车往来芝加哥,生活成本低。而现在,你若坐飞机飞过朗伯德,会发现那里已经成为芝加哥的郊区,独户住宅绵延不绝。如今,该地区有了小型工业,从前则是农场的天下,大家每天在城市与郊区之间来回。

斯特夫:你常去芝加哥吗?

蒂利:经常去。芝加哥是必去之处。想来趟短途旅行之类的事或购物

的话,肯定去芝加哥橡树园区(Oak Park)。大家常去芝加哥。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芝加哥奥罗拉与埃尔金铁路,所以到那里去很方便。

斯特夫:高中毕业后,你离开家乡,到哈佛大学读书。那你高中时对社会学感兴趣吗?还是钻研历史?或两者都非最爱,而是喜欢其他科目?

蒂利:我想那时候的我,从几个方面来看,多少更像个诗人。我喜欢语言、文学。刚进大学,还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就在想,离开埃尔姆赫斯特应该很有意思。

斯特夫:哈佛这个大学城可不小,你怎么想到要去那里发展?

蒂利:哦,那是因为我拿到了哈佛的奖学金。我在当时名叫“百事可乐奖学金”(Pepsi Cola Scholarships)——即“全国优秀学生奖学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s)的前身里,发挥出色,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结果好多大学一个接一个地发出奖学金邀请,其中一份就是来自哈佛的。相比考试,这似乎是很吸引人的邀请。不过,接受邀请就意味着离开家乡。许多亲友认为,要是去的话,既与老家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也很不安全。

斯特夫:到哈佛念书?

蒂利:对,正是。离开家乡,到了哈佛,就是到了灯红酒绿的东部地区,那里满是民主党人、天主教徒,到处是各种外国人。

斯特夫:看来家里人不太支持你。

蒂利:是的,他们特别不赞成我去。

斯特夫:你在履历上提到,你还是个学生时就多次当工人、建筑工人、看门人、守夜人、办公室勤杂员、野营顾问、精神病医院研究员。大多数人的履历可没有像你的那么丰富多彩,为什么呢?

蒂利:我想,首先这表明我对学园之外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是有一定认识的,至少是一段时间内的情况。从我整个职业生涯来看,我一直对寻常百姓的工作感兴趣,这份履历就是证明。此外,把从事过的工作罗列一番,很有意思。这让我知道我在校园之外、从经历过的世事中学到了什么。还有一点,这是一种经验的获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我对人生百态至少有了一定了解。

斯特夫:在哈佛读本科期间,你研究什么?专攻哪部分?

蒂利:我起初选读历史课程很不喜欢。我上了基础历史课。说真的,我对时间地点很不敏感,因而讨厌历史。我记不牢,常将人物和地点搞混,后来再也没选过历史课程。实际上,我立马转投当时叫作“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的学科。上了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的课程后,我对社会组织产生了浓厚兴趣。正是乔治的课程,让我对社会关系如何产生大规模和小规模的作用而着迷,让我确定要钻研的问题。即便后来我与乔

治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了鲜明的分歧,但我依旧接受了在入门课程中探讨得出的部分观点。我就这么一门心思地继续从社会学的角度钻研社会关系。后来,社会关系研究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等。

斯特夫:读研时霍曼斯也是你的导师?

蒂利:我想,在我的研究生生涯里主要有3、4位导师。一位是政治学家山姆·比尔(Sam Beer)。他教授的基础课程《西方思想制度》非常棒。在该课程中,还有其他兼任教学工作的研究生出现,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克劳斯·易卜斯坦因(Klaus Epstein)以及一大批很有趣的人物如诺曼·本鲍姆(Norman Birnbaum)等,真是英才汇集。尽管我没有真正紧跟他的学术兴趣,但山姆那时就已才思过人。实际上,直到近几年,我才在如英国政策等问题上再次与他的作品发生思想碰撞,我从山姆那里受教良多。还有一位老师是彼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我大约是从大二、大三的时候开始上他的课,一直读到了研究生阶段。在本科毕业时,正是索罗金劝说我留在哈佛,不要去别的地方。他提供了精神病医院助研金,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家,并教导我糅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理念。而我的论文导师是乔治·霍曼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他们从不同角度指导我。他们的政治观点迥

异,这对拍档很有意思。

斯特夫:我读过你为霍曼斯写的悼词,上面提到了对摩尔的评价。^[1]

蒂利:对,正是。

斯特夫:我搜集了相关材料,发现霍曼斯一直叮咛摩尔,要他效法祖宗。

蒂利:是啊。我猜巴林顿·摩尔的曾祖父就是克莱门特·摩尔(Clement Moore),即《圣诞前夜》(*Night Before Christmas*)的作者。无论如何,摩尔来自纽约有钱人家。乔治认为,你若是从纽约或波士顿来的——最好是波士顿的有钱人家——那你应该举止得体。从这个角度来说,乔治觉得摩尔有点怪。

斯特夫:那他对你的行为有何评价?

蒂利:他察觉我打算加入海军后勤部队,就发表了一番议论。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讲到了这桩事情。他根本不赞成我去,认为我还不如去做前线军官。抛开这桩事不谈,乔治身为资助人,很伟大。而作为就业市场的资助人,就不敢恭维了。说实在的,他从来不用去找工作,巴林顿也是,后来我就吃到了苦头。但在哈佛大学里,他是个出色的资助人。他正为自己的大手笔洋洋得意,很不幸,美国海军搅了局。他安排我担任洛厄尔学院(Lowell House)社会关系的助教。难处在于我还是洛厄尔学院的本科生。埃利奥特·珀金斯(Elliot Perkins)是

学院里亲英派的领军人物,对社会学极为不屑——就是由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注音、一半拉丁语一半希腊语构成的社会学(sociology),牛津大学显然没有开设——既然牛津大学不重视,那么哈佛大学或是洛厄尔学院又何必搀和呢?不过,乔治依据以下三条理由对埃利奥特·珀金斯开展工作,希望他对我网开一面:首先,蒂利是洛厄尔学院的本科生;其次,他去过牛津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再次,本科时研习了拉丁语。

斯特夫:成功了?

蒂利:是的。他帮我搞定了。很不幸正巧碰上军队征兵,我决定以一名本科生的身份参加哈佛大学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部队(NROTC),应征加入海军,这就毁了乔治的计划——在洛厄尔学院培养一位社会学家。

斯特夫:我明白了。你是在从海军退伍后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

蒂利:不,我已经开始读了。我于1950年中期本科毕业。随后进入精神病医院工作,是挂职的。我把大部分心思扑在了医院工作上,渐渐习惯了那个很特别的环境。不过,我没有忘记这是挂职锻炼,硕士学位还是要的。我获得了亨利奖学金(Henry Fellowship),第二年就去了牛津大学,之后返回美国。这一年才是我真正上研究生课程的一年。随后便开始了为期数年的海军生涯。

斯特夫:那退伍之后又是什么

情况？

蒂利：离开海军时，我差不多准备着手论文写作了。1954—1955年的时候，我回到校园，做好了准备。我最后旁听了历史课程。我从克雷恩·布林顿(Crane Brinton)的法国革命史课程里接受了一些有意思的自由主义观点，甚至还有一点来自他的资助。克雷恩·布林顿是个更为特立独行的人，不过无论如何，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我构想了论文的规划，获得社会科学委员会(SSRC)的奖学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1955—1956年去了法国，进行学位论文写作。

斯特夫：这就是你学术事业的开始吧。后来你还是上了历史课。

蒂利：对。

斯特夫：那你为什么又会选择那些历史课程？

蒂利：好，我就来讲讲自己的故事吧。我为山姆·比尔代教，讲到法国革命，几个有想法的本科生问道：“老师，乔治·勒费弗尔(George Lefebvre)认为，旧政权腐朽不堪，人民几乎一致支持革命，引发了一连串不同的革命，但你怎么没注意到这也是西方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革命？”^[2]我答道：“啊，问得好。”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教授法国大革命课程让我认识到我们的教学方式有问题。大家通常以这样的方式教法国大革命：比起已有解释的含义，更多注重的是分类的证据。此外，只要思考稍一深入，

就会发现逆向的解释，极具启发性——有一类人拥有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或动机之类的东西，能解释他们的行为——对我来说意义不大。上述两点结合起来思考，法国大革命早期似乎很让人困惑，已有的几种解释确实都有不足之处。我说：“啊，这真的值得花心思去研究。”

斯特夫：当今许多社会学家不会那样去思考了。

蒂利：是啊。

斯特夫：为什么查尔斯·蒂利会那样做？我的意思是，这种问题历史系的学生会感兴趣，而你怎么也感兴趣起来？95%、98%的社会学家不会为此事操心。

蒂利：对，是这样的。嗯，前面谈到的部分内容，展现了学者试图标新立异的情况。学者从某种角度尝试找到能独树一帜的见解，所以世人对有些问题的见解依然和而不同，但殊途同归。我想这也符合在这里谈到的情况。我认为哈佛大学的教师配置绝妙无比，相互之间能产生“化学变化”，就是一种体现。把比尔、索罗金、摩尔、霍曼斯放在一起，他们以一种或其他的方式，让当时社会分析中的理论问题与一些历史分析手法实现交合。他们开拓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从而不必仿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式的社会学家。

斯特夫：我想知道，你是否也受帕森斯的影响？

蒂利: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把自己摆在非帕森斯社会学理论的位置上。在我的政治意识成长时,有了隐约的社会主义意识,这肯定不是霍曼斯或巴林顿·摩尔言传身教所致。当然也不是索罗金。倒是有点受山姆的影响,对,就是山姆。我在共和党得势的芝加哥郊区区长,却与之相左,萌发了模糊的左翼意识。我想,原因部分是这样的:“好吧,是否有种方式,既否定而在实际上又展示了对帕森斯社会进程观念的脱离,以及现在我称之为平民主义(populism)的也多少包含在内——对失败者的某种界定等等?”这大约已经成为我的偏好了吧。

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构建一种批判方法——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少数学生以及相关人士摒弃了帕森斯范式——拒绝循规蹈矩。不过时机并不成熟,纯粹停留在观念上,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有关这方面的所有努力、他们的逆向思考,形成了一种观点:应该探讨真实的历史背景,要有重构当事人经历的能力等等。这就是打破传统的呼声的一部分。

斯特夫:你的论文现在变成了《旺代》(*The Vendée*)这本书,对吗?^[3]

蒂利:是的。

斯特夫:你在30年前出版的《旺代》中认为,所有历史都是以往的社会行为。30年过去了,对此说有何增补?

蒂利:我现在就想修订下。现在我认为,历史就是一切社会行为。在

《旺代》问世之后的岁月里,我越来越像个历史主义者。事实上,最近20年来,我一直在向社会学家传递这样的信息:若不知道你所考察的社会进程的时空背景,你就无法理解它们。人们喜欢要么完全以现在的目光、要么抛开时间地思考问题;或把问题转移到过去,并认为各种各样的社会表现都是外在的。我依然认同这样的观念。不过,我着实对从时空模型中锁定要考察的任何社会进程的方法更感兴趣。

斯特夫:有人说你是历史社会学家、社会历史学家。

蒂利:就是说我两者都不是,对吧?

斯特夫:对。正如人们所说的,需要重新审视你,因为你两边都不是,人们继而关注你的立场究竟站在何处、你到底是什么“家”。

蒂利:实际上我很幸运,一直能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保持对话——特别是这三类人——还有几位人类学家,没有重大话语障碍。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搞社会分析的历史学家。我的意思是,我的方法一直是把政治进程分析历史化。但并不见得我使用的方法属于历史学家的范畴。我一直把自己置于历史之中思考,尝试进行定位,比如以真正的历史视角、而不是所谓的抽象对比框架结构,对革命、国家形成进行分析。

斯特夫:从这篇论文的写作到后

来出书，你怎么会想到采用把城市化与革命、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方法？你是如何建立联系的？

蒂利：我想有两点。首先，马克思主义者和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时期的见解，已经提供了一种阐释手法。乔治·勒费弗尔和他的追随者已经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将农村革命与城市革命进行对比。然而，不能很轻易地将这种方式引入对旺代地区的研究中。但无论如何，这引发了对农村与城市的作用之于革命关系差异的质疑。勒费弗尔的体系，也就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时期构建的体系，对阶级差异极为关注，而这种差异又与区域差异对应。对之，我加以研究，觉得这种思考方式的主体，由于把革命看作一个整体，似乎比已有的其他方法更有意义。

其次，当年抵达法国西部不久，我就领会到如何彻底吃透原始材料。对我来说，这是一次考验——我没有接受过档案处理、历史学等方面的训练，其中的故事我稍后再讲。我发现，该地区城乡冲突以及作为革命活动前哨，以小型纺织业或商业为本的城市，都十分重要。城市对抗着由自己——革命本身的始作俑者所描绘的敌对的乡下。大家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点。至此，可以这么说：“好吧，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应该关注不同区块城市与乡村相对的影响力、关联性，将之引向一类地理学问题。”此处，你

可以看到法国选举社会学与区域地理学以外的另类传统。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乃其中翘楚。^[4]这已是对政治倾向作为城市化或至少是资本化的集中所产生的作用的思考。

正如我在新版《旺代》所作的新前言中指出的那样，我是多么希望没有把那段时期描绘成城市对抗农村或与之相似的事物，没有做如此糟糕的事。不过我认为，这是不错的开始，我的直觉也是理性的。而我的阐释体系并不是非常有成效。在创作中，我确实没有注意到资本化内部的关联、小商业者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到写作后期，越发感到明显。

斯特夫：我们正是通过你的发现，才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蒂利：对。

斯特夫：你前面说还有个故事要讲？

蒂利：对。1995年10月，我和学生、同行在阿姆斯特丹开会，太有趣了。诸多发言者之一，来自耶鲁大学的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讲了我告诉他的故事，充作他演讲的开场白。那时，我们正在一起研究法国档案。我首次造访旺代首府昂热(Angers)的档案馆。可我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天晓得该怎么下手。我只好用法语询问档案保管员：“给我一份文档。”结果我很走运。而下面这段故事约翰并没有讲到。那时我真的太幸

运了。有个叫马塞尔·福舍(Marcel Fauchaux)的地方史学者,是当地乔治·勒费弗尔的拥护者,当时也在场。他干的活很杂,既做过许多编辑工作,又写过一些有趣的专题论文等等。他也在同时对档案保管员说:“给他《申诉名单》(cahiers de doléances)。”事后他告诉我,他当时听到了我的话,感到难以相信。然后,我就离开了。

最后,我没有在《申诉名单》上花太多心思,但后来发现它给了我非常好的启发。1789年人民提出的申诉虽五花八门,但可以按区域进行一定程度的划分。这种想法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必须承认,思绪不受成规束缚真好。

斯特夫:到那家档案馆去,你有何期待?

蒂利:我清楚——总有一天我会考量,是否还在坚持当初递交社会科学委员会的提案,到现在也是。我确定自己要运用一定的区域比较法。1789年到1793年,昂热附近地区在革命实践方面已显示出高度一致,在反革命时期更是如此。这点我已经很确定了。该地区以外满是反革命势力,故而成为了共和力量的堡垒。

我曾有个糟糕的想法。在改写博士论文时,已将之推倒。不过,我还是把它保留在论文中,作为某种回溯。我曾坚持一种非常简单的现代化观点,即现代化地区是革命的,而传统地区就是反革命的。到完成论文时,我

已将之抛弃大半,但还有不少架构在里面。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要关注那些地区,比较它们的都市化、富裕程度如何,它们各自的情况等等,依照它们的政治倾向进行互相对照。”这种理念我早已有之,就是不知道到底在何处能加以运用。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在旺代,而不是在昂热的原因。昂热是安茹(Anjou)的中心。不过,我一直坚持这种想法,相信自己会带回许多地区的大量信息,并会通过某种方式对这些信息加以比较;而我不能确定从中能发掘出什么来。

斯特夫:有一点需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讲,你选择的旺代是一块相对小的地区,时间也大致限定在1793年,而随着你的研究深入下去,现在出的书的标题拓展了:990—1990年、1000—1800年等等。以一位美国学者的视野来看,年代相当漫长。你是否感到:关于社会进程及城市化,必须以个案研究为基石才能推动你得出其他各种观点?

蒂利:嗯……回想起来,我确实以那种方式使之合理化。我认为历史学家一直贯彻这样的方针:他们几乎不会过于直白地把话说清楚,而是在事实上让人感到他们拥有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就像人类学那样,就好比没有做过一些田野调查,那么你对民族志材料的阐释将毫无想法,而且根本没

有资格去做。若在以原始史料为主、尝试重构发生了什么、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等等时,没有一些立脚点,那你肯定做不下去;在试图对别人也运用过的材料作出阐释时,亦会犯严重错误。为此,我提出一个回顾性的观点,不过我没有奉之为金科玉律。我的研究朝向更大的主题。原因很简单,我一直保持与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对话。在其他问题上,试图告诉他们,为什么应关注我的做法。我不能平常地对他们说:“嘿! 1793年3月,法国西部的某个村庄,发生了奇妙的东西。”这样说不会吊起他们的胃口,除非我能把它和其他东西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这样,我一开始对研究法国革命产生了兴趣,就难以割舍。而我也没有放弃专题作品的创作。我有本新书,内容的时间跨度达75年。我想,这本书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对1758—1834年大不列颠王国的深度分析,重点在于这一时段伦敦内部的发展。^[5]我继续运用对个体事件或冲突的深度分析,作为一种推理的方式考察事物如何保持运转。这里需要运用历史学方法。但我并不是单纯地从事历史学家的的工作。我在革命史、法国史、法兰西国家史、到最后从整体考察欧洲国家中,对一些事件作了阐释,我确实对锁定这些事件感兴趣。

斯特夫:你所运用的城市化理论完全脱胎于社会学吗?起初,历史学是否也有影响?

蒂利:很难讲清楚。

斯特夫:那我们能否对你所作的解释进行定义呢?你是否坚持那种城市化理论?

蒂利:在当时我觉得有用,但这是机械的概念,我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极力坚持。这个概念绝大部分来自社会学。若你对旺代地区以及构成这种城市化概念的思想渊源的一支作一番回顾的话,会发现霍普·蒂斯代尔·埃尔德里奇(Hope Tisdale Eldridge)、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之类在社会学领域中打人口学擦边球式的人物,就是他们系统地阐释了这种概念。^[6]有些地理学家继续着这种思维方式。我对那种传统,如艾伦·普瑞德(Allen Pred)所秉承的、比尔·斯金纳(Bill Skinner)在人类学中所运用的、或者说从那时起你我都有所接触的各种新观点,不太清楚。^[7]这种传统就是对城市结构的专题研究。而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我虽身在哈佛,却从未上过老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Sr)的课程。我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学术思想。所以,那时我的城市化观念很是狭隘、机械,实为一短。

斯特夫:我经常在想,历史学家通常会追逐其他社会科学。比方说有人花了10到15年作研究,而历史学家会把研究成果拿来为己所用——正如生态学派之类的遭遇。

蒂利:当然。